

社会与思想丛书

# 晚期资本主义 的文化逻辑

&

詹明信 著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社会与思想丛书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S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

&

詹明信著  
张旭东编  
陈清侨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天津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美)  
詹明信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2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1103-4

I.晚… II.①詹… ②张… ③陈… III.后现代主义—  
詹明信—文集 IV.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679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875  
字 数 356千字  
印 数 00,001—15,000册  
定 价 26.80元

DE 201/8

##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大陆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旨在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主要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阙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 s. 共和主义 (P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上世经末以来一

## 编者序言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老一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萨特、威廉斯等)相继谢世的今天,詹氏几乎已成为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里)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作为当代为数不多的在跨学科、跨地域范围里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风云人物,詹氏深深卷入了自后结构主义兴起以来西方理论界的一系列论争,并在某些极具争论性和开创性的理论领域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詹氏在两个在许多人看来相互排斥的问题领域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地位,并彻底改变了人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思路。一方面,他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

家、分析家和病理诊断师；另一方面，他又是 80 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最富活力、最雄心勃勃、最多产和系统的实践者。

在“共产主义”和许多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全面退潮的“冷战后”时代，詹明信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一如他的知识产量一般毫无低迷的气象。在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又一次宣布历史已经终结的今天，詹氏独具慧眼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它唯一的研究和批判对象——资本主义一道重新获得了空前的问题性、活力和重要性。在专业化、体制化、理性和商业化似乎杜绝了一切有关未来的想象的消费主义时代，詹氏把寻找历史的无穷变化和复杂矛盾，探索文化本文同广阔的社会经济境遇的有机关联定义为自己批评旨趣的核心。正如他在编者为本书所做的专访中指出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个宠然大物本身同时构成了当代社会经验和理论叙事的连贯性和不连贯性，构成了他的批判思维的“构成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

置身于美国学术界这部宠大的文化生产机器中，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即美国文化的“本土”批评家(尽管以美国学术界的口味，这位萨特和阿多诺的门徒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欧洲中心论”者)，詹氏的批评活动一方面具有与文化工业及其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颠覆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也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从自己的批判对象身上获取了种种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力量。把自己的课题锁定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氏的写作获得了

许多西方学院理论家无法企及的广阔视野和强大动力。如果19世纪的寓言精灵只是在游荡于巴黎商业街道时想到了商品的疆域,那么对于后现代历史阶段的辩证论者,资本和资本的符号所及之处,一切都变成了寓言。

詹氏这一理论上的战略姿态只有通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实践和批评实践才成其为可能。然而詹明信并不以理论家自居,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之精神所在。无疑理论建设本身在詹明信著作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但在他看来,理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不在于其自成体系,而在于它所揭示、所叙述的问题。詹明信的读者往往忽视了一点:他那似乎是无所不包的“总体论”或“大叙事”并不是一个理论运作的框架,而是一种历史信念和乌托邦理想的指涉系统。在具体的理论分析过程中,詹氏的原则决不是任何本质主义的决定论或高高在上的逻辑演绎,而恰恰是具体的分析、兼容并包的归纳和流动不居的“中介努力”。如果辩证法是詹明信的叙事原则,那么这种辩证法既不是一种哲学体系也不是一种方法体系。正如他在访谈中明确指出的,辩证法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来自主观的原则,而是人与环境和历史的永恒变化之间的近于绝望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自己的主观性决裂而去接受严酷的现实法则,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主观和环境的假像所包围而回到这场斗争的起点。在此,真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为了在这个瞬间找到一个讲述历史变化和现实矛盾的叙事,人们不得不永无休止地

向时间的激流、矛盾的不可穷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蒙昧发起攻击。詹明信相信，能够传达这一真理过程的不是哲学，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文学实验，是基于“再现的不可能性的再现的努力”。

从这种批评的旨趣出发，理论本身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它必须被视为特定环境的产物。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本文的破碎性之中。这对目前流行的种种理论迷信，无疑是一副良药。

不断历史化的前提自然而然地引申出詹明信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政治、文化语境及其差异性的高度重视。正是基于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基于对环境的具体性的重视，詹明信对自己理论活动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有着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但使他对美国知识分子提出了种种尖锐的批评和热切的要求，也使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充满纯正而诚挚的期待和同情。作为一个专业训练同中国毫无关系的学者和批评家，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所抱有的近于狂热的兴趣和信念是所有詹明信的中文读者有目共睹的。他不但对鲁迅、老舍、毛泽东这些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巨匠有着熟稔的了解，对台湾新浪潮电影和香港通俗文化亦有极深的兴趣。

自詹明信 1985 年访问中国大陆，并在北京大学进行了长达一学期的系列讲演以来，中文世界陆续翻译了不少詹氏的文章，其中相当部分是理论上的重头戏。在詹氏的代



表著作仍缺乏系统的中译本的情况下,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或许有助于中文读者一窥詹氏批评活动的时空跨度和理论特征。在中国文化圈(包括港、台、大陆)日益暴露在以美国为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工业及其意识形态的强大火力之下的今天,詹明信的理论思辨和批评攻势也许新添了十年前大陆“文化热”期间仍不具备的一层现实意义。

由于参与人员的分散和各自情况的变化,此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历时三年,最终仍在匆忙中结稿杀青。许多文字体例上的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作为编者,我想在此感谢诸位译者的支持和理解。这个译本的功劳应归于他们。感谢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等机构慷慨授予詹氏文章中文版的版权。特别感谢詹明信教授本人,在繁忙的教学、写作和学术活动日程中抽出一整天为中文版的出版接受编者的长篇采访。这个近三万字的访谈录是一把打开詹氏思想世界的钥匙,也是一个极好的进入当代理论问题论争的导引。

最后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整个文集的构思、酝酿、集稿和发排,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他的心血、智慧和令人叹服的专业效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的编者是我们两人,而不是我自己一人。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我的挚友甘阳先生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关注,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张旭东

1996年1月,新泽西

编者序言 5

# 社会与思想丛书

- |             |        |
|-------------|--------|
| 开放社会科学      | 华勒斯坦等  |
| 资本主义的未来     | 舍勒     |
| 价值的颠覆       | 舍勒     |
|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 韦伯     |
| 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 | 韦伯     |
| 资本主义的动力     | 布罗代尔   |
| 诠释与过度诠释     | 艾柯等    |
|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 柯拉柯夫斯基 |
| 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 哈贝马斯等  |
|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詹明信    |

# 目 录

编者序言 1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1

——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

## 上编 理论

1 文本的意识形态 53

2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 145

3 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 194

——主体的位置与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

4 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 260

5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275

6 德国批评传统 301

7 法国批评传统 322

## 下编 境遇

8 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 339

9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 396

---

目 录 1

- 10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420
- 11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516
- 12 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547

#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  
接受采访录(代序)\*

## 一 理论的历史性

**张旭东:**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理论语言”的全貌以及您“方法论”的构成。一般人看来,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继而创造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批评风格。您能否谈谈当代“理论”发展中不同取向相互渗透的过程,以及这种渗透在您本人工作中的表现?

**詹明信:**这里有几桩事情需要交待一下。

---

\* 1995年12月31日,于芝加哥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

首先,我们所泛称的“后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包含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它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以法国情形为例,二战后主导法国思想界的当然是存在主义。但它很快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而结构主义的问题性正是在此刻开始凸现的。我所指的不是结构主义本身的立场,比如语言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之类,而是它所探讨的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一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生发出来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寻求一种更为贴切精微的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所有具体的后结构主义题旨都来自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还要补充一点:我近来还对另一种重要的影响来源深感兴趣。这便是布莱希特的影响。布莱希特在1944、1945年间在柏林布莱希特剧院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人们一般并不把布莱希特视为哲学家或理论家,但他的辩证思想却为日后的后结构主义明确了任务,这就是反人道主义。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两种事物的猛烈攻击。一是对经典资产阶级传统的攻击(而卢卡奇则为这一传统辩护);一是对所谓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攻击(卢卡奇显然又是这一观念的倡导者)。这种反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等人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阿尔都塞写过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两者间的联系是清楚的。人们也都知道一些

问题是由布莱希特提出的。

我所要强调的是，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在战后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的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是他们各自议题中的基本因素。

这也可以说明另一个让某些人感到吃惊的现象，即德里达为何要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一两年前我们都看到了德里达谈马克思的书（按：指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英译本题为 *The Spectres of Marx*）。我认为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现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大理论家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再强调一次：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德勒兹的情形亦是如此，尽管不幸的是德勒兹生前未能写成他的论马克思的巨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一种多重性：一方面他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他也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这一基础发展出来的。这一切把他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至于你的问题在当前理论界的具体反映，我想这同“理

论”的本质有关。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理论总不免要变成不同的理论商标。如果有人觉得这么说太不恭敬，那么我们可以说理论往往以多种“名牌理论”、“个人习语”或“私人语言”的方式存在。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master language)的办法，而我们甚至连这样做的欲望也没有，这就造成了你问题中所暗指的局面：一个人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可是一转眼又说雅各布森的语言，或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或拉康语言。人们常常指责我在这一点上搞折衷主义，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语言上着眼。这就好像有些事情只有用法语说才清晰有力，有些事情只有德语才讲得明白，到了法语里就一塌糊涂，而又有些事就非用中文不行。理想状态应该是随你所讨论的问题而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但这几近于不可能。从这一角度看，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某些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联极为密切，尽管这种关系并非一眼就可以看破。

讨论这类问题必须重构具体的历史环境，否则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希望在我说明这些复杂问题的同时，这些说明也可以用来引导我们进入一些更为基本的理论、



哲学问题。但我必须标出各式各样的名字,否则就像是我把这些观念都算在了自己的份上。事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毫无疑问在这些哲学指涉的镜像中,不了解原始材料就会晕头转向。

**张旭东:**人们通常觉得您一半是“法国”的,一半是“德国”的——前者指后结构主义,后者指法兰克福学派。现在您告诉我们这个“法国”并非只是同“辩证批判”相对立的种种语言学、符号学和“理论”,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一部分。

**詹明信:**对,是这样的。我在学生时代就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并接触到法、德两种学术思想传统。但这纯属个人背景上的偶然因素。人们往往习惯于在法、德两种传统间选择,或扬“法”抑“德”,或扬“德”抑“法”。我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觉得它非常古怪而可悲。前面已经说过,我并不认为严丝合缝的综合可行。同时我也不觉得借用来借用去是个成功的办法。以阿多诺在法国70年代的借用为例,人们当时把“反同一性”的阿多诺列在后结构主义的名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对阿多诺思想的歪曲。此类结合并不如意。如何在不同立场间对话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人们不妨回忆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话,或乔姆斯基与福柯的对话。除了在一些基本的政治、文化问题上,在这些语言间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德、法传统两者都是伟大的哲学—理论传统,在